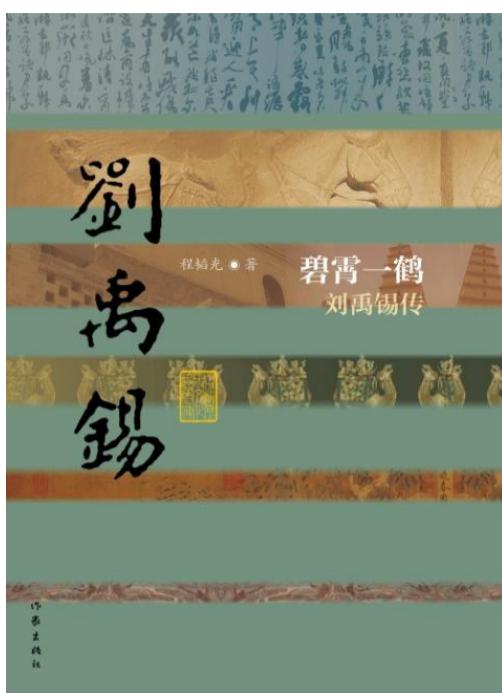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专栏



一种来自于诗经的政治遗嘱,一开始就设定了诗与政治的原始关联,也预设了受诗教影响的士人阶层的悲剧性场景的一再重演。“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来自于《诗经·大雅·文王》的一种代际间的政治嘱托,自此句一出,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演了多少次变法、多少次维新,只要存在着可能的政治空间,每一代都有心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维新志士。而刘禹锡就是中唐永贞新政的中坚力量之一。

对诗歌传统与社会历史之间关系的认知,是程韬光书写刘禹锡和其他诗人传记小说的一个内在激励,十几年来程韬光书写着古代诗人们的传记,他已完成了几种大部头的《太白醉剑》《诗圣杜甫》《长安居易》等史传小说,又在乐圣朱载堉的传记之后,完成了这部《刘禹锡传》。一方面这是缘于程韬光对诗人的情有独钟,他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个诗人;另一方面,为诗人立传最深切的写作动机里依然有着他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尤其是对诗歌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洞察。在程韬光所书写的诗人传记小说中,居于核心的是诗与史的内在关联,是诗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中所投射出的诗的真理。

在刘禹锡身上,又充满着多少诗与政治、诗人与权力之间难以调解的冲突。一个诗人的初心之中有着对诗的热爱,这样一种真诚的热爱如何能够与以谋略、权宜为主的宫廷权力考

量相互协调?在面临权宜性的行动、政治妥协与道义立场的冲突时,这个文人集团的领袖毅然选择了道义,而失败于权宜之计的考量。这是一个诗歌与政治之间的古老悖谬,尊崇“言”的逻辑还是“事”的逻辑:言尊崇的是“道”或意义,“事”尊崇的是成与败。在可能借助利益分化、收买藩镇势力之际,王叔文选择的是“言”而非“事”的逻辑。这个由年轻的文人组成的维新集团最终失败于一个古老的布局:维新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却又未能掌握军事权力。因为他们是一个诗人化的知识集团。

这是“诗教”的结果,就像诗经承诺了维新的使命又避免尊崇现实秩序及其权力一样,诗教所指向的目标与现实场所的行事规则之间包含着无法调和的冲突。尽管我们知道,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诗教,一种对“言与道”的感知逻辑的推崇,将塑造出一种新的土人精神或社会风尚,但却与实现权力的那些手段多半背道而驰。

在传统社会,一个读了诗书的人,都被托付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人生忧患读书始”所涉及的大概也是这个意思。然而,诗经的古老嘱托给予维新志士们的一个古老悲剧是,他们接受了政治嘱托,却不再能够单独地通过诗书或通过“言与道”的逻辑来承担起“事”的成功。对刘禹锡、柳宗元这些早年成名的诗人而言,不再忧虑自己的生计而是忧虑所说的苍生社稷时,他们似乎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人。言与道、诗与书放大了个人的自我意识而丝毫不怜悯书生的脆弱。诗书——语言——道——使他们僭越了位置,使一个普通人要担当超越个人的责任,在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那本是一个王位,或许是一个仁慈神灵的位格。他们通过阅读诗书——通过语言——接受了前辈人的希望与责任的嘱托。然而他们在世俗利益高度固化的社会里,根本没有那种权威和那种力量,用以完成这种被古人的诗经所托付的维新之责。

以至于当我们看到新政失败,诗人遭遇贬谪之后,似乎贬谪之路、贬谪之地才适合于诗人的心性。程韬光对失败际遇中的诗人有着独到的理解,他描写了刘禹锡贬谪朗州之初,常

立言与立功的反讽

——读《碧霄一鹤——刘禹锡》 □耿占春

作怨天尤人之愤,然而当最初的愤懑消退之后,哲学思维的理性之光重新照亮了刘禹锡的世界。

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都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识,其中言与道的意识远远大于其个人意识。每个人都是言与道的一个临时化身,完成使命或“完成”意义的临时聚集。把语言放在那个致命的和神秘的位格上,而不是放在一个肉身之人身上:既不是那个必不可少的犯有过错的人也不是同样脆弱的心理学的自我。它们都不配那个担当苍生社稷的位格。那是一个属灵的位格:言与道。个人命运只是它的一次短暂的停顿,一次勉为其难的和临时的化身:仅仅是在一个诗人读过的东西上增加一点点已成为个人的修辞秘密的切身经验之痛。

程韬光描述了刘禹锡在朗州的9年,政治上的失败成就了他的哲学之思,他得到了一个坚强无比的灵魂,但妻子长眠于此,青春一去不返。在同时被贬谪的柳宗元元亡没3年之后,刘禹锡终于找回了诗思,将郁结在胸的不平与缅怀呼喝而出。诗是另一种遗嘱,一种纵然一再地失败也依然不失为希望的意志。诗或诗教就是这样一种责任的秘密传递。然而从历史的这一端看过去,从屈原、李白、杜甫直到刘禹锡、柳宗元之后的王安石,甚至到晚明独抒性灵的倡导者,诗也能够成为一种逃避权力的方式,把诗的写作转变成一种快乐,把责任降低到言说的欢乐,这是他的自卑自谦,也是一种摆脱自身命运悲剧的计谋。

当刘禹锡再次被贬谪夔州之时,已经重新焕发了诗人的活力,他从民间歌舞中不仅感受着生活的欢乐,也激发他汲取方言俚语即“竹枝”风格进行新的诗歌创造,甚至颇有了几分功比屈原《九歌》的自信。此刻的刘禹锡显然知道自己在沿着谁的足迹,过着谁曾经过的生活,书写着前人曾经书写过的地点。一个人的生活是对典范的模仿,然而就像诗人心中作为典范的诗篇一样,又是对范例的创新。他用新的诗作向先辈诗人致敬。他用新的生活实践向先贤致敬。就像程韬光先前所写的诗人传记一样,他的史传小说不仅注重对历史的书写,注重对诗人传记经验的叙述,也相当注重对诗人

的诗歌与诗学的阐释,在一定意义上,程韬光所写的诗人传记就是对他诗人全部作品精髓的理解,对他们最重要诗作的传记性阐释。

替代直接的政治变革的政治选项退出了宫廷和诗人的个人生活,从而变成与精神生活有关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教化即诗教。对刘禹锡来说,写诗变成了一种新的政治选项,一种替代立德和立功的立言,他从“事”与“策略”的逻辑返回了言与道的逻辑。如果说王叔文在为着成事的逻辑中不适当当地遵从了言与道的逻辑,从而致使维新集团败北,同样在刘禹锡和柳宗元这里,甚至在言必称古的韩愈那里,立言总是与立功、立德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无意识的冲突。立言总是隐含着未被觉察的、却显露在他们命运之中的对立功、立德的反讽。因此,一种政治的诗歌即《大雅·文王》回到了诗歌的政治,即回到一种不带争议的、唤醒共识性的感知,即通过《乌衣巷》之类的诗歌对社会进行新的集体精神的建构。

然而,在刘禹锡身上,言与义的逻辑再次露出嘲讽的效力,一个与诗歌精神悖离的宫廷政治中诗人命运之讽刺。大和二年春,刘禹锡调回京城,然而,这位诗人似乎已经注定了要为成就他千古传颂的诗句付出仕途的代价,当年一句桃树寓言“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引发轩然大波使之二度遭贬,此际,刘禹锡似乎使自身的命运再度重蹈诗歌的隐喻与反讽,就像诗歌不可避免的受到音乐般“重复”节奏的诱惑一样,刘禹锡不可规避地再度来到玄都观,他再度发现了桃树的预言。程韬光写道:“满目的荒凉,在刘禹锡眼中却别有一番滋味。他无意于幸灾乐祸,但却忍不住发出由衷的嘲讽”: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玄都观里的桃树化为一种政治寓言,玄都观、桃树与政治压上了韵,连种桃的道士也变成了政治寓言的一部分,诗人在此发现了道观、道士与桃树与政治权力的自发性的关联。程韬光这里的表述非常精准,并非诗人心怀恶意,而是忍不住寓言自身所发出的“由衷的嘲讽”。

并非玄都观是刘禹锡命中的煞地,诗人的仕途命运便是如此荒唐:事实上它受到“言与义”逻辑的嘲讽,克制不住的隐喻、寓言与嘲讽并非诗人心中的恶意,而是一种对事物的感知力,一种隐含在事理或情境中的隐喻与讽刺。无奈朝廷中的人们并非隐喻与反讽思想风格的欣赏者,权力的专断者不接受任何反讽。因此刘禹锡第二次在玄都观题诗,又令他的仕途遭遇了最后的挫折。来自于文王和诗人的,来自于诗经和维新志士的,是双方都忠于同一项事业:尊崇和追随“言与道”、“言与义”的话语逻辑,他们总是世间一切事物之间异质性关联的发现者,而非尊崇和维系支配现实的既定事态的固化力量,他们都渴望建构新的感知、新的生活形式,在这种新的感知方式或生活形式里,政治的禁锢相当于对意义的贬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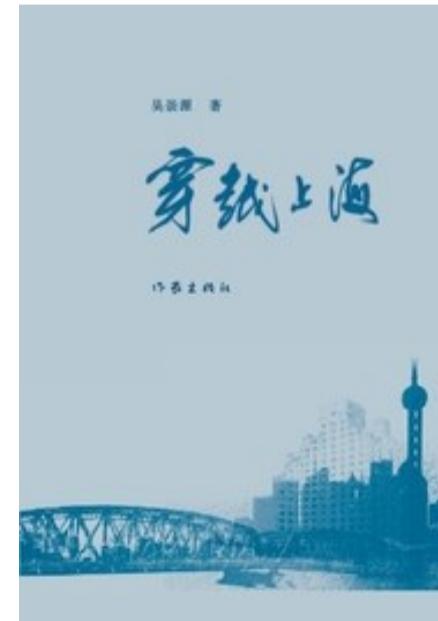
来自于诗经的古老的维新嘱托,这一诗歌与政治的构想将一种维新的使命置于食古不化的陈旧体制与诗歌的活力之间,突显这个整体图景的是活着的感知力量,诗歌的使命是通过将理念转换成活的图像令它们变得可知可感,从而创造了一种西周政治神话的对等物。但这一诗歌与政治的构想并没有具体的策略与方案,它仅仅像遗嘱一样简洁,却又像诗歌本身一样,成为社会精英和一般平民能够分享的经验。这就是程韬光多年来潜心致力于书写古代诗人们传记小说的价值之所在:无论诗人们的遭际如何,他们心中最珍惜的是言与道的力量,是言与义的逻辑,直至从传至久远的维新嘱托中锻造出一个民族的良心和它的感受力。直至针砭时弊的、切肤之痛的话语在王朝颠覆之后依然有效。在那些词语被使用了千年之后依旧能够干净地归还给一个民族,归还给后世的这些道义的学童。

千年之后,一个王朝的新政之失败似乎仅仅是为着成就伟大的诗人。那些让诗人遭遇政治失败的言与道、让诗人命运多舛的言与义即一种由隐喻与反讽所传递的意义,最终成就了一个民族不朽的诗篇。当我们阅读刘禹锡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诗人,他的精神世界不是任何一个帝王的臣民。

现实的新生面与时代的新人物

——评吴崇源的长篇小说《穿越上海》

□白烨



如何近距离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深刻演变,深入而独到地表现这种时代巨变带给人们的精神新变,一直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的薄弱环节。正在人们不无疑惑又满怀期待之时,吴崇源的长篇小说《穿越上海》适时出现了,这不啻给当下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带来一丝亮光。

作为企业未来研究者的吴崇源,小说创作之于他,纯属正业之外的副业。但长期对企业运营观察研究的经历与心历,却使他比之一般的作家更具切实的生活积累与痛彻的生命体验。当他把这一切投入创作、带入作品之后,就使得《穿越上海》端的不同凡响,确乎别有寓意。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也饶有新意的是,既在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书写上别开生面,又在时代新人形象的着力塑造上锐意出新,这样两个方面的艺术进取,既有力地成就了《穿越上海》一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同类题材的已有写作。

《穿越上海》以本世纪头一个10年为背景,以当代商贸大都会上海为场景,描写改革开放进入深入水区之后,以苏泰达为老总的太一公司在内外压力下的克难攻关的具体过程。饶有意味的是,太一公司因是民营企业,苏泰达因是民营老总,便被盛昌发这样的国企老总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搞倒压垮而后快。买通无良记者来写负面报道,暗中挑唆股东执意退股,串通银行高官不予贷款,直至联手政府要员要并购太一,为了致苏泰达于死地,盛昌发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但苏泰达审时度势,处惊不乱,接连以毅然退货赢得顾客信任,变卖家产换取资金等手段,先做好自己,稳住阵脚,终在鼎力相持之中等来盛昌发因贪腐行为东窗事发,使公司涉险渡过难关。

苏泰达与盛昌发的殊死斗争的过程,既是两位老总的个人比拼,又是身份与地位不尽相同的民企与国企的体制较劲,还是借民企以创新和借国企来寻租的不同力量的正负较量。这样一个富含了多种意蕴的矛盾与冲突,既以民营企业的艰难生存与艰难成长,披露了新生经济力量兴起与发展的不易,也以行业内部的新旧体制的相互抵牾与新旧观念的此消彼长,揭示了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

必然结果与内部景象,让人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对于科技创新、经济振兴,乃至体制突破、观念更新的多重意义与巨大作用。因此,苏泰达与太一公司在困境中的突围和创新中的进取,既是民营企业顽强崛起的一曲凯歌,更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巨轮必然滚滚向前的一曲颂歌。

更让人为之欣喜的,是作品所着力塑造的苏泰达这个人物,堪为具有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气质的新新人物。苏泰达这个人物,与我们通常所见的改革家形象,多了一些性情的真实,也多了一些理想的高蹈。他并不讳言自己是资本家,但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破解资本家的实质;他把民营企业鼓得风生水起,但他的目标却在于为消灭私有制而努力;他务实又务虚,一边在为资本运作殚精竭虑,一边在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苦苦思索,力求在这个旷世难题上作出新的文章来。他以接连践行人力资源的价值回归,放弃资本分红等方式,尤其是捐弃前嫌去回头帮扶陷入困境的国营企业,显示出了其博大的胸怀、不凡的气度与远大的追求。

吴崇源在小说创作上,不独生活积累丰厚,写作素材丰沛,而且在以情节构筑故事、以细节刻画人物上,也运笔自如,卓见功力。他尤其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不同人物的各自性情,更长于运用情理交融的文笔刻画主要人物的精神世界。因此,他笔下的主人公苏泰达栩栩如生,光彩夺目,他笔下的童端仪、王雪晴、李虹绵、丁健等女性人物,也都春兰秋菊,各具风仪。可以说,这种小说技法上的心领手敏,与他生活经历的丰富多彩是相得益彰的。有鉴于他的这种双向造诣的卓尔不群,我看他的小说创作,尤其是与新生活、新人物有关的现实题材的写作。

游记不难写,写得好的游记却少之又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游记名作,涉足海外的不多,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翡冷翠山居闲话》,朱自清的《欧游杂记》有过较大的影响。当代作家中我印象深刻的余光中和已故的杨朔先生,前者的《登楼赋》、后者的《蚊山》在不同年代里触动过我的心弦。随着国门开放和中国人走遍世界,阅读好的游记已不再是脱离现实的奢望,石湾老友的新作《海外游记》就是这样一部令我欣喜的上乘之作。

石湾早年写诗、写歌词,后来编戏、写报告文学,近年来他发表的散文也相当可观。诗在他的笔下,好像是越来越远了,但当我徜徉在他所经营的这方图文并茂、丰富多彩的游记天地才终于明白:他的诗正如他的人一样去了“远方”——只有行走在广阔又迷人的世界上,曾垂青于他的缪斯又开始为行者而歌唱了。无论是在新西兰的《荧火洞》中神秘又紧张地探索那悬挂岩壁的人间银河,还是在“美女云集”、生机勃勃的《死海飘浮》中优哉游哉、仰面看书;无论是在穿行2000公里的欧陆风光中,饱览满眼绿色的《大自然的乐土》,与哥德、海涅、贝多芬的故乡对话,抑或在贝多因人居住的帐篷部落里“过年”、在越野吉普狂飙撒欢的沙山上“冲浪”……从“耳顺”之年走到“古稀”之年的石湾,不仅像年轻人一样活跃和精力充沛,他笔下的文字也时时迸发着诗的火花和奇思妙想,而且更难得的是,科班出身于南大历史系的他,对于今日世界的了解与诠释,决不会止于走马观花的表面,在他心灵的旅程上总有一种或许是缘于史学的认真与细致、诗学的浪漫与单纯的奇妙结合,能够到达匆匆“过客”难以企及的深度和广度。

不必说像《卡夫卡故居》《走进奥斯维辛》这样年代还不算久远的历史记忆,在《寻访耶路撒冷的足迹》这篇上万字的长文中,石湾以生动的笔触沿着以色列4天行程中的参观路线,对基督教创始人的生平事迹和“三位一体”的基本教义作

眼中世界 笔底诗情

——读石湾新作《海外游记》

□冯亦同



了引人入胜的介绍。从位于耶稣家乡拿撒勒的天使报喜堂,到巴勒斯坦境内伯利恒的圣诞大教堂,再到耶稣讲道故地加利利北岸山区的八福堂、五饼二鱼堂,最后到“和平之城”耶路撒冷橄榄山上的主泣教堂,以及耶稣受难时背负十字架走过,以今日圣墓大教堂为终点的“苦路十四站”……公元前那部影响过世界历史和人类心灵的宗教悲歌和“基督史诗”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说实在的,苦路十四站走下来也确实有点累了,但每个游客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都会感到自身的经历的坎坷与苦难比起耶稣来,恐怕算不得什么。生活在信息化的今天,我们理应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去背负或轻或重的‘十字架’,走向美好的未来!”——读到这里,我不禁在心里为我的诗人老友、行者石湾的感叹大声喝彩。

我为之喝彩的还有他和他的老伴童心的数百张摄于世界各地的“翩翩丽影”,为这部印制精美的长篇著述增色不少。他俩的出行用今天电视上的时兴话来说,可谓“花样爷爷奶奶走世界”,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夫妻秀”,绝无荧屏上某些明星和“小鲜肉”的扭怩作态。尤其是童心嫂人如其名,镜头中的表现极佳,配上石湾兄的美文,可谓秀外慧中,相得益彰。在童话王国首都哥本哈根,童心看到一群幼儿园的孩子趴在公园水池边嬉戏,很想同天真可爱的洋娃娃们合个影,但语言不通,急中生智的她竟抖动肩膀跳起蒙古舞来,孩子们纷纷回头注视,靠拢过来,路人也驻足观望,一张精彩的“中西合璧”的童心彩照,便同小美人鱼塑像、安徒生铜像一起,定格在这篇同样精彩又富个性的《丹麦新童话》中了。